

关于夔公盨资料的问题(下)*

竹内 康浩 著
高芳·王晖 译

第二节 作为西周金文的特征

本节将考察该器铭文在西周金文中具有什么特征。西周金文自身虽然并不是极具历史性,而且不容许有例外的严格规定的资料,但是文章的形式,结构以及表现方法都还是有一定类型的。在上一节里已经考察了文章的内容,在此主要想探讨一下文章的形式和结构。

1. 神话的历史以记叙的形式叙述

该器铭文的开首,不是像西周期长铭金文通例那样以纪年日辰开始,而是“天命禹敷土……”以遥远的过去,也就是把神话的历史作为叙述部分来展开。

在西周金文中,像这样叙述过去的事情时,一般采用“某曰……”的形式,在王或者重要大臣话语中几乎都是这样的表现。前边所提出的迷盘就是一个典型,特别是言及周文王,周武王时,一定用此形式¹⁷。但是,也有例外。番生簋的铭文,是这样开始的。

“丕显皇祖考穆穆克誓毕德,(以下省略)”

也就是说,不以“某曰”开始,而是采用了作器者用陈述的方式讲述其祖先的功绩的方式。但是如果综观铭文全文,基本上还是常见的有关官职任命的册命金文,在什么场景,是什么部分等都是很清楚的,确实是作器者的道白。从使用的用语来看,也非常类似于“某曰”这种叙述形式,或者说只是省略了“某曰”而已。形式上虽然非十全十美,但至少不会因暧昧不清而引起混乱¹⁸。

*原文刊发于东京大学文学部史学会《史學雜誌》第115編第1号(2006年1月)。因原文太长,分上下两次刊载。此为下半部分,含原文中的第二章第二节,第三章,第四章和结语部分。

¹⁷言及文王,武王的金文里像大盂鼎,史墙盘,毛公鼎这样有很长铭文的器具比较多,都是在“曰……”的叙述中出现。

¹⁸宋代就为人所知的师匄簋,铭文很长,超过了200字,而且开篇就以“王者曰”开篇,接着是官职任命,也就是说到了骹词部分就结束了,本来应该放置在铭文开始部分的“某年某月某日辰,王致某……”却放在了文末,这是极为例外的构成。如果把师匄簋铭文末尾的“某年某月……”的部分移到开始,就和通常的册命金文的形式一致,如此改变铭文结构也是可理解的。如果该器也是因为某原因把原本应该放于文章开头的“公曰”偶然放置到文末,那么把那部分放回文首,铭文全篇就成了公的道白了。但是,叙述了民和德以后,言及太古关于禹的传说,然后再度言及民和德,如此一来,文脉显得混乱。可以认为该器与这样的结构处理无关。

然而,该器不是册命金文,是在什么情况下言及过去的也就不明了。另外,因作器者没有清晰的说明,对铭文构成的整体状况很难把握,也就不能单纯地看作是省略了“某曰”。(公也不一定就是作器者)

2. 铭文前后给人有遗漏的感觉

从西周金文的常例来看,该器的铭文是在既没有关于年月日的记述,也没有明确记载谁是主人公的情况下展开,铭文结尾也是在极短的叙述中很唐突地结束的。李学勤相当早地(去锈前)看了该器,他记述看后印象时说“乍读似乎是无头无尾,不知所云”,他这样说也是理所当然的¹⁹。

然而,该器铭文似乎是在这一器物上完成的。关于前述①中所言之异例的开篇方法,或许该器的铭文实际上可能是更长的铭文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较长的铭文也许分载在复数的器物上。加之考虑到该器铭文的结尾过于唐突这一点,可以说可能性更大。虽然极为少见,但是铭文分载的例子在西周金文里还是有的。例如:倮匚(牧牛匚)铭文就是分别记载在盖子和器身上的,春秋后的秦公簋也是一例。另外,壘盨也是和该器一样同属盨类,虽然上半部分不知去向,但是铭文也是分载的。因此像以上种种的器物那样,该器的铭文也是分别记载在盖子和器身上,或者几件器具上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可是,关于这一点,可能性显然是非常小的。如后面(第三章)所述,该器的盖子并非如想像那样制作,这就否定了铭文分载于器身和器盖上的可能性,同时也否定了分载于复数器物上的可能性。另外,如果参照上述的铭文分载例的话,在倮匚(牧牛匚)的铭文从器身向器盖延续的时候,是从“今大赦汝”一句中的“赦”转到“汝”的(盖子上第一个字是“汝”)。文章完全是一个整体,显然器身写不下了自然转到了器盖上。秦公簋的铭文则是从器盖开始的,从“万民是敕,咸畜胤士”的器盖的“敕”向器身的“咸”移动(器身的第一个字是“咸”),秦公自身的话语自然延续,文章就是这样完全相连的东西,壘盨²⁰也是这样,也是从文章中途连接部分开始的。也就是说,铭文分载的情况下,下半部分完整地独立于上半部分,正好从一个意段开始的例子是没有的。像该器这样的例子没有见过。这也是该器铭文分载可能性很小的一个理由。

因此,只能认为该器的铭文就此结束,结果就不能消除作为铭文完成度很小的印象。其偏离了西周金文体例这一点不得不引起注意。

¹⁹ 贺平《大禹治水与为政以德(代前言)》中说“不少专家认为没头没尾。”

²⁰ 盨的铭文以“又进退……”开始。像白川静指出(《金文通释》184页)的那样,卯簋的铭文里有“今余非梦先公又进退”,盨里也同样在“又进退”之前有那一部分。另外,铭文分载在钟上比较常见,但是在别的器具上却极为罕见。

3.作器者以及作器理由不明的问题

殷周青铜器必定有作器者²¹（确切地说应该是订货人），而且有制器原因。当然这些并不一定都会记载在铭文里，再说没有铭文的青铜器数量也不少。但是，西周中期以后，像该器这样拥有一定长度的铭文，却没有记载作器者和作器理由的还是很少见的。很多铭文非常简短，只是写“某作器”，像这样简短的铭文非常普遍的情况下，却连此部分都没有写的，在西周金文的文例中确实属于异例。

试图在该器铭文中寻找相当于作器者的固有名词时，发现的是禹和，夔公两个人的名字。禹当然不会是作器者，关于夔公，也像是对别的什么人说的感觉²²，让人觉得不是作器者本人。所以只能认为该器虽然有很长的铭文²³，但是作器者和作器理由都不明了。关于这一点，确实让人抱有很大的疑问，为什么起草了那样的铭文并把它记载到了该器上？

以上三点说明了该器铭文的显著特异性。当然西周金文也有时代的变迁，内容和形式也显示了很大的相异之处，但是在西周的任何一个时代来看，该器铭文依然是极为独特的。这也就是诸位学者觉得该器铭文费解难读的原因所在。另外还隐约透露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的感觉也是理所当然的。西周金文资料读得越多的人，这种感觉越强烈。

第三章 夔公盨的特征

本章将考察该器作为西周青铜器的特征。上一章所探讨的铭文是篆刻在青铜器上的文章。在考察它的真伪时，不用说必须先考察器物自身。伪器配以真铭是不可能的，所以想先从这个入手。其次，铭文所呈现的各种各样的稀有特征只是孤立地显现在铭文里，还是同时器物本身也存在一些稀有的特征呢？在这里主要想考察一下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

首先最重要的是要确认器物的真伪。非常遗憾的是，既没有亲手触摸该器，也没有摄像调查，所以很难说拥有确实的一手信息资料。但是基于对公开刊登的资料照片和亲眼所见时的确认，通过明了地观察器物总体间隔，可以认为，该器确实是用和殷周青铜器一样的制作方法而制作的。从这个意义来说，不可能是用后世的制作方法制造的伪器。首先可以确认它是真器。

²¹松丸道雄「西周青铜器製作の背景」，《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紀要》第72册。后来又收在注14所记载的书中。

²²裘锡圭说“公似即作器者，所以暂名次器为公盨。”这也好像并不确信公就是作器者。

²³在作器者不明的情况下，关于作器理由可以想象的有一种可能，就是不将铭文中的“民”理解为“民众”，而是作为专有名词的人名，将其作为名字没有出现的作器者的祖先。如此一来，该器就成了子孙为祭祀祖先而作之器，也就成了常见的殷周青铜器。公就是“民”所侍奉的君主，对于继承祖业的作器者，君如果是彰显其祖，这也是殷周青铜器的常例，作为作器理由完全可以成立。只是，以上不过是推测而已。

器种是盨。属于西周以后出现的常见的器种。该器圈足较高,作为盨的形体较为稀有。颈部饰有鸟纹,腹部到圈足为瓦纹饰。从纹样来看,也可以判断为西周中期至后期的器物。只是鸟纹看起来并不很好,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有些拙劣。另外,受器物表面瓦纹²⁴的影响,其腹内壁也相应地作凹凸状,这是极为少见的。瓦纹在西周中期以后经常用于装饰簋的腹部,但从亲眼所见的簋的几个实例来看²⁵,几乎没看到过瓦纹影响到器物内壁的例子。作为容器使用的器物内部,从盛装食物的用途来说,也是没有凹凸比较方便,而且就殷周青铜器而言,器物表面的纹样一般不会影响到内壁,从制造工序来说,为了与表面的瓦纹和谐一致而特意加工内壁也是很费时费工的。虽然还无法明白该器这样做的必要性是什么,但是不得不承认,这种做工极其少见。

器身两侧附有兽首。从正面看,兽首有眼,通常情况下会在那里镶嵌上一个环纽,但是该器现阶段没有。没有环纽就不能捧拿,那么是不是该器的环纽过去丢失了呢?很多盨为了便于捧拿附有把手,但像该器这样的盨实属少见。尚不清楚的问题还很多,这也正表明了该器的稀有性,也正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所在。

该器口沿的形状也是一个重要特征。盨这种器种一般是附有器盖的。已出土的盨中虽然也有没有盖子的,但是此时为了能够盖盖子,会在口沿设置衔接部分(瓶嘴),本来是有盖子的就不用质疑了。但是,该器的口沿没有设置为了盖盖子的衔接部分。关于这一点该器也许是唯一的例子。没有能够盖盖子的衔接部分,并没有失去作为盨的功能,所以并不欠缺实用性。但是该器与盨这种器种的惯例,常识不一致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呢?不能不说确实给人带来了很大的疑问。另外,该器因为没有设计盖子,所以关于铭文一开始给人唐突印象之事,该器的铭文分载在器盖和器身上的可能性也就被否定了。而且关于通常器身和器盖同为一套的器种,因为没有器盖,所以接连不断的较长的铭文分载在数件器皿身上的可能性也就被否定了。因为通常是器身器盖同为一套的器种,如果特意不做盖子,却做好几个器身,而且把一连串的铭文分载在几个器身上的做法²⁶,与常识相去太远。所以,关于铭文唐突的开始和结尾依然是一个疑问。

还有一个问题,只是看公开刊登的资料上的照片还不明白,亲眼看了实物才引起注意。那就是铭文所处的位置。铭文被铸造在该器的底部,那当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如果从上边看的话,铭文不在内底的中央,明显偏左。也就是说,铭文的右侧有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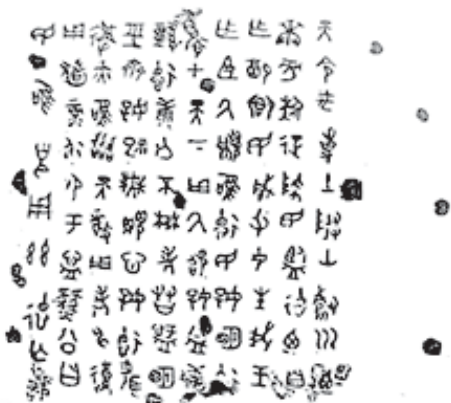
²⁴朱凤瀚曾经指出过,而且笔者亲眼确认了。

²⁵即使不是对照着器具确认,从拓本上所留的瓦纹痕迹可以明白的例子也是有的。谏簋(《两周》录101),三年师兑簋(《两周》录150)都是盖子上有瓦纹痕迹的例子,而十二年大簋(《两周》录74-75)则是盖子和器身都可以看到的例子。别的几乎没见过什么例证,但是因拓片采集方法的不同,也不能说完全否认这种方法的存在。而且这个簋作为表面上的纹样,瓦纹和不得不表现的东西,通常好像比器身瓦纹要宽一点,也许与其说是纹样,不如说是造型更为合适。

²⁶参照竹内康浩「西周中期以降における青銅器製作の背景」『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25册,1994年。

²⁷表明盨的施铭位置的资料极少,至于把盖子和器身分开观看其中的资料几乎没有。过去曾经师克盨(《分类》A252R403)的盖子和器身分离开来的内部照片。根据那张照片可以判断107个文字的铭文很真正地雕刻在盖子和器身上。(而且,关于师克盨铭文的位置问题,《殷周金文集成》虽然登载了陈梦家的摄影作品,但是不明点很多,不便利用)。另外,最近马承源监修的《上海博物馆中国瑰宝①鬼神和礼乐之器—青铜器的世界》(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1

的留白，左侧则相对狭窄²⁷。显示盨的铭文放置位置的资料极为少见，所以很难说绝对，但至少就所见到的来说，铭文几乎都位于正中。这和字写得好坏，铸造人的技术没有关系。只是铭文放置在内底的正中这样的一个视觉均衡的问题。如果只是部位配置错误的话，是完全可以改正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很值得怀疑。如此这般铭文部位一直在内底偏左，而且相隔距离的配置也与铭文完全对应。该器内底的间距配置完全如图所示，可以确认纵向四列，各列各三个。对于面积比较宽大的盨底来说配置得非常充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间距配置毫无可疑之处。换言之，铭文的位置让人疑惑，而间距配置却很合理。



图：间隔块(涂黑)及施铭位置
(竹内制图)

如果从青铜器²⁸的制作工序上来说，绝对是铭文在先，间隔块在后。铭文不在内范内设定好的话，在内范的外侧配置间隔块组建外范是不可能的。但是，从上述该器铭文和间隔块的位置来看，不如说是逆向而行，好像铭文是为了适应间隔块而配置的，这个印象很难否定。殷周青铜器铭文的布字状况和间隔块的位置是有机关联的，而该器在现在间隔块的位置，铭文放在内底正中是不可能的。铭文第一行，从上边数第五个字的“土”字右下方有相当大的间隔块，现在所看到的铭文稍微向右移动到内底的正中，因那个间隔块的影响，不能有适合的配置。不管是改行还是留出空白，如果铭文在先的话，都增加了不必要且不可能的麻烦，也就是说，要把现在这篇铭文铸造到有这样的间隔块配置的器物上的话，没法配置到正中间，稍微靠左一点比较容易。所以，如果硬要怀疑的话，那么就是先有了间隔块，然后才有了铭文。也就是说有可能是后人补的铭文(伪铭)。但是，虽然是什么样的理由造成的还不明白，但是铸造铭文时有些错位并不是绝对没有的，另外，就所看到的铭文部位的照片来说，后人将器物腐蚀并将铭文铸造进去的可能性，我也不能判断，顶多只能提示也许有补铭的可能性而已。然而，关于铸

年)登载的很多器具铭文部位的照片非常有用。其中盨的照片登载了三张，分别是伯大师鬲盨12(105页)，蓼生盨(109页)，梁其盨(112页)。除了伯大师盨不明以外，其余两器很明确，铭文几乎都是雕刻在正中。另外，如果看了该书所登载的其他器种的照片，也就会完全明白，铭文都是周正地雕刻在中心位置的。同事也就明白了，那个偏离了正中的公盨是何等特殊。

²⁸松丸，注(21)，同前。

铭位置, 该器在殷周青铜时期中极为罕见, 这一点可以肯定。

综上所述, 即使单从殷周青铜器的观点来看, 该器实属罕见的几个特征也非常明显。不过, 从器种, 纹样来看, 可以确认它具备了西周中期或者更晚时期青铜器的特征。换言之, 虽不能说该器在器种, 纹样上完全不合规格, 但是细看还是有几个非常罕见的特征的。

第四章 关于夔公盨资料的问题

以上在前三章里, 就新近被介绍的夔公盨进行了检证。鉴于该器铭文所具有的重要性, 采用了通过特征检证内容的方法, 从铭文和青铜器两方面对资料的信赖性进行了论述。本章将进行最后的总结。

首先想论述一下该器真伪的观点。正如以上反复强调的那样, 该器虽然具有很多极为罕见的特征, 但是却没有与殷周青铜器不相符的特征, 所以笔者认为它不至于是伪器。从制作技法上来看, 它明显采用了殷周青铜器的外范分割法, 所以将其判为真器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作为西周青铜器(作为盨这一器种), 的确比较稀有, 多少还留有一些让人感到疑惑不解的部分。

另外, 关于铭文也存在不少极为罕见的特征, 因此值得慎重探讨。关于铭文整体的构成以及在该器上首次呈示的语句, 表现等两个问题, 与众所周知的有关西周青铜器知识, 常识并不全面也有关系。加之考虑到该器铭文文字不甚端正、良好这一点, 还是有必要对此持怀疑的目光去审视。

对内容与形式检证的结果, 如上所述, 可以明确地说, 与目前为人所知的西周金文不相一致的地方很多, 很令人疑惑。文章的构成也采用了史无前例的叙述形式, 也可以看到一些在西周金文里首次问世的人物、词语和表现。另外因为与文献资料相符处很多, 所以如果将其看作西周金文的话, 就不得不承认这些特征太离谱了。如果分别来看的话, 每一个特征都很特异, 存在一些令人疑惑之处。一个个独立来看并不是绝对不可, 但是如此多的疑惑点积在一起, 就只能综合判断为不可了。从以上所述的该器的特征来看, 该器在西周青铜器中不会有什么地位, 进一步说, 不仅不能在殷代占据席位, 甚而也很难放置于春秋和战国。春秋战国以后, 明确记载作器者姓名更属理所当然, 像该器这样, 到底是谁为什么做器的都不清楚的铭文是没有的。

因此, 该器不能看作是西周的资料应该是现在所能做出的最妥当的判断。从该器的特点来说, 并不拥有西周金文、青铜器常见的样式、体例。西周金文, 如果大约是拥有上百字左右的长铭的话, 一般理所当然的从纪年开始, 再进一步明确记载作器者的姓名、作器的理由等。然而该器不但没有这种常见的样式和体例, 而且也没有简单明确地

记载特别的理由与事实(不如说很不明确)。虽然采用了作为西周青铜器常有的盨这种器种,但不做与口沿相吻合的盖子,瓦纹却延伸到了腹内壁部等,均未按照一般盨的“样式、体例”制作,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理由。特意如此还是无意至此,不甚明了,而且铭文和器物都与一般样式、体例不一致。该器的这种与向来所熟知的被称为主流的金文、青铜器资料相异,这不由得让人考虑是否存在着在某特别原因、情状之下制作此器的可能性。比如:地方样式,或者如松丸道雄所说在诸侯的制作间做的等等。但是,即便不再主张以上诸说,该器所具有的特征,已经不是所想像的范围能够的问题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形状也好,在诸侯的作坊制作的也好,虽然少见,但是无可怀疑。但是,该器的确有难于理解和令人困惑的地方。当然,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首次问世,所以并没想否认其可信性,而且确实还不存在可以完全断定它是伪作的铁证。

因此,关于该器,在进一步调查之前,笔者现在所能作的判断是作为资料使用还是稍缓一些为好。笔者认为至少以该器的出现把禹的神话提前到西周之主张的提出还是应该谨慎一些。

另外,如果万一该器的铭文是伪作的话,那就一定是据现在很近的年代的作品。一是铭文被铸造的时候避开了间隔块,二是该器也使用了在1975年出土的文物上第一次看到的文字。如果以此两点为依据的话,那么就是充分掌握青铜器研究知识的人参与了这件器物的制作,而且从研究史²⁹上来说这也可以判断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的作品。可是,如果是研究者参与的话,也就不会有如此多的可疑之处了,至少这种可能性是最不愿意相信的。

结 语

以上就近年所介绍的新资料,对夔公盨的可信性问题进行了检证和探讨。很遗憾,由于资料不足,还不能做出充分明了的结论。但是,目前首先应该采取慎重的态度。应该等待使用X线调查的结果,也不能忽视其他的判断以及依据不同判断标准而得出的结论。至于要把禹的神话追溯到西周的问题,还不能说已经定论,期待今后继续检证探讨。

著录略号

《两周》: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九三五年。增订新版一九五七年。

《分类》:陈梦家(松丸道雄改编)《殷周青铜器分类图录》,一九七七年。

²⁹尽管以前就知道间隔块的存在,但是松丸道雄在「西周青铜器製作の背景」(注21,同前)中将其与殷周青铜器的真伪联系起来,并且明快,充分地指出其在制作技法上所具有的意义。这篇论文1977年刊载。另外,公盨铭文第九行第五字的“”是在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出土的鬲(牧牛)里第一次出现的文字,这个器具是1978年在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中第一次被介绍的。无论如何,我们是很难想象,没有任何预备知识就制作出一个伪品,然后再公布这个发现。